

第二章

「文學自覺觀念」提出之學 理基礎 ——以魯迅為思考中心

時至今日，「文學自覺」已成為概括六朝文學特質的重要觀念，甚至被當作是整個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判斷，其不論對於後人「研究六朝文學」，以及「了解中國文學史之整體發展」，皆有深遠之影響。然而，在「文學自覺觀念」已經如此蓬勃地被引用的現今，令人遺憾的是，「文學自覺」一詞的出現，總被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可追溯者，僅及目前被認為是「文學自覺觀念的提出者」——魯迅先生，以及由魯迅先生所發表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這一人一文共同組成大家對「文學自覺觀念」的重要印象。

但是，在「文學自覺觀念」在六朝文學與中國文學史上的詮釋影響力逐漸增大的同時，我們實在不能滿足於以上簡單的理解當中，並且更感到去了解「文學自覺觀念究竟是怎樣形成」此是萬般重要之事。

「文學自覺觀念」究竟是如何產生的？它在怎樣的基礎之上為魯迅所提出？魯迅何以能提出「文學自覺」來概括「漢末魏晉之際的文學發展」，形成現在我們所認為的「文學自覺觀念」？促使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何等隱形而不可見的力量？他所以能提出「文學自覺」的判斷是本身對魏晉文章的興趣？對魏晉文章的

獨特體會？還是受到其他人的影響？這當中實在有太多牽涉到觀念形成的深層問題。這些問題都必須得到更進一步的思索與探討，才能夠對於我們了解「文學自覺觀念」此一命題的真正內涵，以及後人運用「文學自覺觀念」，有所助益。

我們都知道要掌握「文學自覺觀念」，其形成基礎乃是了解此觀念的重點所在，因為「文學自覺觀念」絕不是春光乍現、突然迸生的產物，不明白觀念為了甚麼原因被提出，只根據觀念的有效，而一再地引用，這對於觀念的理解與使用可謂毫無幫助。然而，既然如此，為何目前有關「文學自覺觀念」的基礎卻仍乏人關心？分析其原因，或許是因為雖然魯迅先生所提出的「文學自覺觀念」，對於六朝文學整體特質具有很強的概括性，的確道出六朝文學發展的神髓，因此能夠持續的被引用，絕不是件偶然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文學自覺」四個字容易流於失之過泛的弊病，更嚴格講來，也不符合現今學術定義下，所謂「文學批評術語」的標準，其內涵更缺乏明確的義界，於是探討其形成來源也連帶不容易。還有也跟「觀念研究」本身的難度有關係，由於要弄清楚觀念的由來，本來並非容易之事，有限的線索，再加上個人心聲心畫甚難掌控，面對已經作古的前人，要推敲其提出某觀念之真正意圖，往往一不小心，便差之毫釐，失之千里。雖然探究「觀念的由來」是件困難的工作，但如果暫且放下對此的敬畏之心，從宏觀的角度視之，其實，觀念畢竟也只是人心意念的產物，固然無法像科學實驗有個結果，以便研究者斬釘截鐵地說明：某個人的某個觀點，必然與某事相關，但我們卻可以從歷史留下的線索，去玩味、去想像，拼湊出一個脈絡，至少是接近的可能。

所以，探索「觀念產生的形成基礎」，仍然是不可懈怠的重要課題。因此，本章擬以「魯迅」先生為中心，由於目前大家公認是因魯迅先生與魏晉文章的碰撞中，才有現在的「文學自覺觀念」，姑不論魯迅先

生是不是在歷史中第一個有此想法，或是第一個提出「文學自覺」這個詞的人，不可否認地是，因為魯迅先生的緣故，才致使「文學自覺觀念」特別容易為人被「接受」與「難忘」。是故，無論如何，魯迅先生之於「文學自覺觀念」的發揚光大，都是居功厥偉，且無人可望其項背的，更不用說學界普遍公認「魯迅先生為『文學自覺觀念』的提出者」。因此，要檢證「文學自覺觀念」的原始意義、真實意義，以及了解此一觀念的價值和地位，了解魯迅提出觀念背後的種種因素是確屬必要之事，更是理解「文學自覺觀念」所以提出的重點所在。

同時，本章就以「魯迅先生為甚麼提出文學自覺觀念」此一問題意識為核心，試著探討「文學自覺觀念所以為魯迅先生所提出的原因，且要補充的一點，此問題當中有魯迅先生個人的因素，也有外在影響作用於他身上的成份，所以我們雖然以魯迅先生為中心，但實際上這其中關涉的並不只是魯迅先生個人之問題，也與歷史發展進程當中，總體對六朝文學認識的加深與成熟有關，有鑑於目前學界對於此觀念的形成，尚未有共識和討論的情況，我們希望透過「文學自覺觀念」此一重要觀念形成背後成因之探討，企使大家了解「文學自覺觀念」所以提出的學理基礎。

以下文中將分別從兩方面著手進行，一是從魯迅先生本人的因素出發，看看構成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的個人因素為何？魯迅先生如何在浩瀚歷史長空之下親近了「魏晉時期」？在魯迅先生與魏晉時期的聯繫關係不斷被提及的今日，此一聯繫關係背後隱含著魯迅先生本人與魏晉時期怎樣的因緣際會？同時，是甚麼使魯迅先生對魏晉時期的文學、社會等現象發生興趣？我們發現魯迅先生在個人稟氣上與魏晉時期的親近，是其提出文學自覺觀念的重要關鍵，包括了他與魏晉名士的基調相符、對魏晉人物的熟悉、魏晉文章的愛好，以及文章風格流露出與魏晉文章的雷同。

二是從影響魯迅提出「文學自覺觀念」兩段深厚的師承關係來看，熱愛魏晉玄文的章太炎先生，以研究中古文學的開山祖師劉師培先生，這兩人對六朝文學的熱愛與關注，如何使魯迅先生能夠體認到「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以及，魯迅先生如何各自如何吸收、認同、轉化、深入章太炎先生與劉師培先生兩位的對魏晉文學的判斷？和具體而言，魯迅先生的「文學自覺觀念」在那些方面，曾深受兩者之觀點的提點，這些因素如何零零總總加以來，導致魏晉文學能在魯迅先生的心中，慢慢凝聚成一個「自覺」的總體印象？以下就進行我們的討論。

第一節 魯迅提出「文學自覺觀念」 之精神基礎

關於「歷史」，周國平先生是這麼定義的，他說：「無數歲月消失在無底的黑暗中了。可是，我們竟把我們可憐的手電燈光照及的那一小截區域稱做歷史」¹。確實如此，如果我們將「歷史」假設為「一個逝去的時空集合」，那麼身在如白駒過隙的時光之流裡，人們就像百代之過客，彷彿只能憑著自己所能夠理解的視域，去挖掘那個所謂「一小截區域」的「真相」，「歷史」過去了，然而後人卻常扛負著「精神鋤頭」，期待啟古人於「歲月長空」之下，再一次地為我們點撥明亮。可惜的是，如此癡願常屢遭挫敗，所謂「真相」更時常經過個體的挖掘，片片斷斷地令人難堪，讓人不禁在面對這浩瀚的「文化遺產」，感受到自己的渺小與淺薄。

¹ 參見周國平：《經典的理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出版），頁173。

但是，如果我們不以悲觀的心情，來看待這種孤獨的對話狀態，不乞求是非對錯之固定式答案，則會發現每一次的對話都是獨一無二、無法取代的，也會明白每個「個體」在直面歷史之時，固然皆有其侷限性與單向性，同時卻依舊有其不可取代的價值存在，每一場對過去歷史的叩問，都顯示著特殊的靈光閃動。以「魯迅」先生為例，「魯迅」先生之於「魏晉」，單從字面上粗疏地想，似乎僅僅為「個人」與「歷史」的關係而已。但是，透過「魯迅」先生這個已經進入「歷史」之中，甚至成為「歷史」的一部份而擁有巨大影響力的現下，他凝視「魏晉」的目光，已不容忽視，甚至需要就「魯迅」先生凝視目光所及之處，加以思索。假如我們願意給予「個人如何仰望歷史」，賦予更多理解的可能，或許能理解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此說能於後世所以引起共鳴、達到影響的原因。

一、魯迅的生命基調與魏晉名士相符

尹康莊先生曾說：

在中國源遠流長繁複無比的傳統歷史文化中，魯迅對魏晉可謂情有獨鐘。他的字，品骨直追魏碑；他的文章，風格氣韻則與魏晉有直接的源承關係；他的舊體詩，亦蘊蓄著沉雄慷慨的建安神髓；他輯錄的散佚古籍和校閱的文集，魏晉時代的數量遠非其他時代的可比。²

² 尹康莊：魯迅與魏晉，〈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2期。

魯迅先生為何對魏晉情有獨鍾？³以知性歷史散文聞名的余秋雨先生，也曾有討論，或者說這是所有知識份子對於此時期的特殊情感：

像一陣怪異的風，早就吹過去了，卻讓整個大地保留著對它的驚恐和記憶。連歷代語言學家贈送給它的辭彙都少不了一個「風」字：風流、風度、風神、風情、風姿……確實，那是一陣怪異的風。說到這裏讀者已經明白，我是在講魏晉。我之所以一直躲避著它，是因為它太傷我的精神。那是另外一個心靈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僅僅是仰望一下，也會對比出我們所習慣的一切的平庸。平庸既然已經習慣也就會帶來安定，安安定定地談論著自己的心力能夠駕馭的各種文化現象似乎已成為我們的職業和使命。有時也疑惑，既然自己的心力能夠駕馭，再談來談去又有什麼意義？但真要讓我進入一種震驚和陌生，依我的脾性和年齡，畢竟會怯步、遲疑。⁴

目前大家對於魏晉時期的印象，咸以浪漫、風流、不羈的時代著稱，若是將時代比喻為舞臺，那麼魏晉時期的主角，無疑便是那名士獨領風騷的專屬場域。《世說新語》任誕篇：「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在當時，名士的風流軼聞總令今日後人聽來欣然神往，不只如此，魏晉時的名士風采，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人格典型，這種特殊的人格型態與生命情調，無論如何以清談誤國、歷史罪人等理由來數落，都無損於名士其人格魅力與特殊風韻之價值。張師蓓嘗說：

³ 「我記得魯迅很愛魏晉的文章。當時對此並未有很深的感受。及至到了大學時讀魏晉阮籍、嵇康、陶淵明、劉勰的文章，才從當中捕捉到了和魯迅類似的那種深沉浩茫的宇宙感和人生憂患。雖然時代不同，但其中的心靈都是相通的。」引自袁濟喜：《六朝美學》，（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9 年），頁 359。

⁴ 參見余秋雨：《遙遠的絕響》一書，（三聯書店 2002 年 8 月初版），頁 48。

最強烈的感受，應說是對「名士」的諒解與同情。他們以近似狂誕的態度，在亂世中揮灑生命的光彩，一方面有著不為人知的曲折心路歷程，有其不得不然的苦衷，一方面卻仍然奮力於風格的塑造，執著於自我的完成，充份呈現了生命情調的獨特。而伴隨同情以來，往往便是對後期名士東施效顰的反感。他們雖有足夠的聰明，愈後愈佳的生活憑藉，卻徒然陷入既成的格套裡，終致漸漸失去自我。一來一往，其實也就是當時知識份子升降浮沉的一幅反影⁵。

名士們的生命基調與笑容音貌，共為人人所津津樂道，魯迅稱之為「魏晉風度」，直到如今，有關名士的各個層面仍然吸引了人們的興趣與關切。我們不妨在腦海裡試想一幅開卷圖，士大夫穿著寬大的袍子，拿著麈尾、飲酒服藥，各式各樣的奇言異行，從歷史的舞台上出場，充滿著放浪的情懷，「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的曠達瀟灑，「禮豈為我輩設耶？」的豪氣，無一不將此時期點綴的分外美妙。而有人說，現代中國知識份子與魏晉關係最密切的要屬魯迅一人，魏晉時代，確實就如魯迅所言顯得有些「異采」，再沒有一個時代能夠像魏晉時期，如此令人怦然心動的了，整個時代根基的動搖，連帶的個人生命也受到激蕩。

魯迅先生也這樣描述魏晉：

魏晉以來，乃彌以標格語言相尚，惟吐屬則流於玄虛，舉止則故為疏放，與漢之惟俊偉堅卓為重者，甚不侔矣。蓋其時釋教廣被，頗揚脫俗之風，而老莊之說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為反動，而厭離於世間則一致，相拒而實相扇，終乃汗漫而為清談。

6

⁵ 張師蓓蓓：《中古學術論略》序（大安出版社 1991 年 5 月），頁 2。

⁶ 魯迅：《魯迅全集》第三卷，（唐山出版社），頁 65。

如此特別的時代，魏晉人充滿激烈與矛盾的內在張力的心靈，對於生命的憂急、自我的掙扎，以及對於人生無所不在的衝突與倒懸之苦，如何能不吸引著魯迅的目光？魯迅先生說：「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裡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恨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他的生命情調也與名士若有所繫：論戰之辯文，往往不留情面，亦與魏晉人相彷彿：「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⁷「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給他們說得體面一點，究竟是敵人罷——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⁷又與魏晉名士喜愛論辯，且不留情面的作風，有異曲同工之妙。魯迅先生在亂世之中，抱有虛無主義的憤世嫉俗，以為沉默與輕蔑乃個人最高法則，「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⁸、「明言著輕蔑甚麼人，並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有沉默是最高的輕蔑。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⁹此作風較之「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鎚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¹⁰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可見魯迅先生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念，在許多層面上都與魏晉人是相合的，以致於就連在病中仍讀《世說新語》，以求在精神上對魏晉人的同感共鳴：

一尋，尋到了久不見面的《世說新語》之類一大堆，躺著來看清飄飄的毫不費力了，魏晉人的豪放瀟灑的風姿，也彷彿在眼前浮動。由此想到阮嗣宗的聽到步兵廚善於釀酒，就求為步兵校尉；陶淵明的做了彭澤令，就教官田都種秫，以便做酒，因

⁷ 魯迅：《墳》題記，錄自於《魯迅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3 年），頁 52。

⁸ 魯迅：《野草》題辭，錄自於《魯迅論創作》，（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3 年）頁 29。

⁹ 魯迅：病後雜談《且介亭雜文》，引自魯迅：《魯迅全集》第八卷，（唐山出版社），頁 160。而陳平原則進一步地指出：「《世說新語》之所以為魯迅所激賞，除了其『記言則玄遠冷峻，記行則高簡瑰奇』外，更因其並非用以『喻道』或『議政』，而是『為賞心而作』，故『遠實用而近娛樂』。」，值得參考。

¹⁰ 《世說新語》簡傲篇，第三則。

了太太的抗議，才種了一點秫，這真是天趣盎然，絕非現在的「站在雲端裡的吶喊者」們所能望其項背。¹¹

「近人談到《世說新語》的價值，大體均承認它能全面反映魏晉二百年的思想、文化、社會、風教、士人生活，是謂『名士風格』的集中表現；所以馮友蘭先生稱之為『風流寶鑒』，周作人稱之為『名士底教科書』，陳寅恪先生則稱之為『清談之全集』」¹²。由於《世說新語》對於了解魏晉社會的重要性，更由於魯迅先生對於《世說新語》的喜愛，足見其精神上親近魏晉人的傾向。說起來在魯迅先生生存的時代，恰好與魏晉時期十分相似，與傳統價值徹底決裂的亂世中國，禮教嚴酷的箝制，被現實狀態給衝開，於是知識份子的思想鬆綁，時代的總旋律是多元紛雜的。魯迅先生於是應該也就特別能明白阮籍「飲酒三斗，舉聲一號，嘔血數升，廢頓久之」的壓抑從何而來，以及陶淵明「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的感慨，一去三十年」，這在紛紜複雜裡無可作為的激烈與痛苦，因火熱而燃燒成灰燼的心。魯迅先生也曾表達，他體認到人生是條獨特的世路，這條路只能走不能停：「走人生長途，遇歧途，或歇下觀察，或奪人食物，或『不問路』『不哭不返』；遇窮途，就跨進荊棘，『姑且走走』。」¹³

魯迅先生的心情與魏晉名士一樣矛盾：「因為隨手翻了一通《世說新語》，千不該萬不該的竟從『養病』想到『養病費』上去了，於是一骨碌爬起來，寫信討版稅，催稿費。寫完之後，覺得自己和魏晉人有點隔膜。」¹⁴魯迅先生感嘆：「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淵明在面前

¹¹ 引自《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頁100。而陳平原則進一步地指出：「《世說新語》之所以為魯迅所激賞，除了其『記言則玄遠冷峻，記行則高簡瑰奇』外，更因其並非用以『喻道』或『議政』，而是『為賞心而作』，故『遠實用而近娛樂』。」，值得參考。

¹² 張師蓓蓓：《魏晉學術的一種觀察—從《世說新語》談起》，收於《廖蔚卿教授八十壽慶論文集》，里仁書局2003年出版，頁113。

¹³ 《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引自魯迅：《魯迅全集》第八卷，（唐山出版社），頁162。

¹⁴ 《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引自魯迅：《魯迅全集》第八卷，（唐山出版社），頁162。

出現，我們也一定談不來。」，從這些反覆的言辭當中，我們看到在魯迅先生心中固然對於魏晉人生活深所嚮往，然而卻也深知此種氛圍，卻不可能再次重現，於是現實的催逼、時代的動盪不安，益發使得魯迅先生感到與魏晉人的「隔膜」。

魯迅先生對於魏晉時期名士對禮教的曖昧與掙扎，也是了然於心的，寫在墳後面一文中：「當呼吸還在時，只要是自己的，我有時卻也喜歡將陳跡收存起來，明知不值一文，總不能絕無眷戀，集雜文而名之曰《墳》，究竟還是一種取巧的掩飾。劉伶喝得酒氣薰天，使人荷鍤跟在後面，道：『死便埋我。』雖然自以為放達，其實是只能騙騙極端老實人。」¹⁵可見對於魏晉名士的故作放達，在認同之中也有嚴厲的批評，但儘管如此，他的心靈還是常常與魏晉名士相通的，當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失去知音，打從深處的寂寞感與感到痛苦之餘，想起了向秀的文章這樣說：「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裡，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甚麼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¹⁶

除此之外，在馮雪峰先生《遲來的時代》魯迅論一文中，也說明了魯迅先生對孔融、阮籍、嵇康遭遇的共鳴：「魯迅晚年曾以孔融的態度和遭遇自比」我們發現，在魯迅先生心中常有條「現實的疆繩」，將他拴在某種平衡點之上，認為魏晉時候的人，雖然符合我們現今認為「雅」的標準，但這種效果是透過歷史的距離而導致的，如果用這種標準，在自己的生活下照單全收，是不成的。魯迅為了遏止自己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念頭，往下又說：「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陶淵明補了彭澤令，他們的地位，就不是一個平常人，要『雅』，也還

¹⁵ 魯迅：《魯迅論創作》，頁 54。

¹⁶ 魯迅：為了忘卻的紀念《魯迅論創作》，頁 257。

要地位。」¹⁷

其實，魯迅先生長期的自我定位本是「徘徊在雅俗之間的人」，他固然對於「雅」深所嚮往，「俗」世的力量時常將他緊緊地抓攬不放，因此面對與魏晉人的阮籍、陶淵明，他常心嚮往之，又覺是終隔一層。不過，魯迅先生越是如此矛盾？越是顯示一種「迴還往復」的失落感作祟。從魯迅先生病中讀《世說新語》的話看來，以「站在雲端的吶喊者」作為對照，凸顯了對於陶淵明和阮籍的欣賞，實是看重二人能夠在進入紛繁人事後，看似不違背自己本身的意願而活，因此所展現出一副「和藹可親」的誠實態度，故而特取能夠符合自己心境的面向，以求安慰¹⁸。因此，魯迅先生在病中嗜讀《世說新語》以求安慰，除了可說明他本身之於魏晉時代人物風氣和文化氛圍的嚮往，也因魏晉人物的飄逸、天真浪漫，給予人一種超拔世外的解脫感，可以使人暫且稍忘那現實世界的焦灼感，因此，最適宜躺臥病床，甚麼都做不成的病人遐想之用。《周作人文選》中「地方與文藝」一文有云：

近三百年的文藝界裡可以看出有兩種潮流，雖然別處也有，總是以浙江為最明顯，我們姑且稱作飄逸與深刻。第一種如名士清談，莊諧雜出，或華麗，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覺可喜。第二種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其特色不在詞華，在其著眼的洞澈與措辭的犀利。

「飄逸」與「深刻」、「名士清談」與「老吏斷獄」，這些形容，用來表

¹⁷ 魯迅：病後雜談《且介亭雜文》，引自魯迅：《魯迅全集》第八卷，（唐山出版社）。

¹⁸ 魯迅在大量的文字當中，表達自己生命不由自主的悲憤：「我的生命，碎割在給人改稿子，看稿子，編書，校字，陪坐這些事情上」「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實在使我憤怒、怨恨了。將血一滴一滴地滴過去，以飼別人。」引自《魯迅全集》卷七《兩地書》，頁278。《魯迅論創作》：「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頁62。

現浙江文藝的氣質固宜，但似乎也可用來形容魏晉時期的名士，魯迅先生本身生長的地理風氣，或許本身便有魏晉名士的氣息。好友許壽裳先生也在魯迅先生過世之後，於「整理古籍和古碑（《亡友魯迅印象記》）」一文，追悼魯迅先生之餘，為後人對魯迅先生與魏晉之間的聯想，留下了一脈足供後人玩味的重要線索，他說：

魯迅對魏晉文章，素所愛誦，尤其稱許孔融和嵇康的文章。……為什這樣贊許呢？就因為魯迅的性質，嚴氣正性，寧願覆折，憎惡權勢，視如蔑如，皓皓焉堅貞如白玉，懍懍焉勁烈如秋霜，很有一部份和孔、嵇二人相似的緣故¹⁹。

許壽裳先生以其對魯迅先生的了解，猜測魯迅先生喜愛嵇康、孔融的原因，是因氣質的近似，特別是在對於別人壓迫的抵抗上。不過，這個聯想仍然太過狹窄了一點，魯迅先生對於嵇康尤其賞愛，而且歷經多年，他還是不停地大費周章地校勘《嵇康集》多次，「1925-1929年，1933年、1935年魯迅分別在《兩地書》《書信》《且介亭雜文二集》《集外集》等的若干文章中多次提及嵇康，或作為人生境遇的引證，或作為經典推薦讀。」²⁰可見魯迅先生對於嵇康的喜愛，不止許壽裳先生所言，如此泛泛。從許壽裳先生到曹聚仁先生稱魯迅先生是「千百年的嵇康、阮籍的知己。」²¹這除了個性的接近以外，應當還有更為積極的原因。在這方面，皇甫積慶先生的意見是比較深入的，他認為這是因為魯迅先生將嵇康先生視為自己靈魂的倒影，藉由不斷接觸嵇康的作品，與自己對話，以覓求心情的平靜。

¹⁹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摯友的懷念——許壽裳憶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頁23。

²⁰ 轉引自皇甫積慶：《從文學到生命——魯迅與嵇康、阮籍的聯繫與比較》《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0期。

²¹ 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頁179。

每一次校勘就是與嵇康的一次文學對話，每一次對話就是精神的溝通、意識的交流和心理的愉悅。孜孜不倦的校勘，正說明這種「對話」對魯迅來說已超出學術的範圍，進入到相依相親的心理與精神層面。²²

王吉鵬先生也說：

魯迅生活的年代與魏晉時期頗有幾分相似，社會現實的黑暗，政治局勢的動蕩，知識分子的危險處境，千餘年前阮籍、嵇康所處的外在環境無一不在魯迅的身邊重演。……空間上的遙遠距離並不能隔阻魯迅與阮籍、嵇康精神上的相通，在他們的為人和為文中，魯迅得以窺見歷史，也能夠直觀自身，在與他們的一次次文學對話中，魯迅獲得了心靈上的愉悅和情感上的溝通。²³

二、魯迅對魏晉文章與人物之認同

在魯迅先生與魏晉人的聯繫不斷地被提及的同時，要注意的是，事實上，魯迅對於魏晉時期的人物欣賞，不僅只於表面上與他個性相近的嵇康、孔融、阮籍三個人。從曹氏父子、竹林七賢、晉末的陶潛，乃至於何晏、王弼，他都曾給予關注，賦予獨特的理解與同情²⁴。比

²² 皇甫積慶：《從文學到生命——魯迅與嵇康、阮籍的聯繫與比較》《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0期。

²³ 王吉鵬：《魯迅與魏晉文學》，瀋陽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

²⁴ 比如：魯迅於《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中為曹操翻案：「我們講到曹操，很容易就聯想起《三國志演義》，更而想起戲臺上那一位花面的的奸雄，但這不是觀察曹操的真正

方對於曹操的看法，他便主張不要都從「君臣倫理」的政治角度去著墨，因為從這種角度去看，曹操很難翻出奸雄人物的認定之外，魯迅說他認為曹操本身是很有才華的，甚至認為曹操也是個英雄，無疑是能夠接近魏晉時候人物品評的通達眼光。

而對於曹植受後人批評一事——即曹植說過「辭賦小道」抹煞「文學之價值」的言論，魯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為曹植辯護，認為他不是有意要輕視文學，而且對曹植的才氣予以肯定，又能考量其個人政治抱負受挫的悲涼。同時，魯迅對於一般人對陶淵明的認識，也以為不妥²⁵，在這一點上，他提出自己獨特瞭解文學家的方法，他不贊成以「摘句」來概括陶淵明的風格，認為這樣是「以割裂為美的小疵」，提出應該要顧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還有看完全部的作品後，再來歸納，才較為確鑿²⁶。從以上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發現魯迅對於魏晉人物有極深之了解、極大之同情。魯迅對魏晉人物的掌握之外，更常讀魏晉六朝的作品，周作人《地方與文藝》一文有云：

方法。 其實曹操是一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我雖不是曹操一黨，但無論如何，總是非常佩服他。」

²⁵ 『題未定』草：「陶潛先生在後人的心目中，實在飄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裡，他卻有時很摩登，『願在絲而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節，空委棄於床前』，竟想搖身一變，化為『啊呀呀，我的愛人呀』的鞋子，雖然後來自說因為『止於禮義』，未能進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亂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膽的。 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見南山』的是一個人，倘有取捨，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 我每見近人的稱引陶淵明，往往不禁為古人惋惜。」錄自《魯迅論創作》，頁 729。

²⁶ 『題未定』草：「還有一樣最能引讀者入於迷途的，是『摘句』。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來的一塊繡花，經摘取者一吹噓或附會，說是怎樣超然物外，與塵濁無干，讀者沒有見過全體，便也被他弄得迷離惝恍。最顯著的便是上文說過的『悠然見南山』的例子，忘記了陶潛的述酒和讀山海經等詩，捏成他單是一個飄飄然，就是這摘句作怪。」「凡論文藝，虛懸了一個『極境』，是要陷入『絕境』的，在藝術，會迷惘於土花，在文學，則被拘迫而『摘句』。但『摘句』大多又大足以困人的。」錄自《魯迅論創作》，頁 732~735。

對於中國舊文藝，魯迅也自有其特殊的造詣。他在這方面功夫很深，不過有一個特點，便是他決不跟著正宗派去跑……詩歌方面他所喜愛的，楚辭以外是陶詩……文章則陶淵明之前有嵇康，有些地志如《洛陽伽藍記》與《水經注》，文章也寫得極好，一般六朝文他也喜歡，這可以一冊簡要的選本《六朝文絜》作為代表²⁷。

周氏在 魯迅的文學修養 一文也說：

詞章一方面他排斥歷來的「正統派」，重新予以估價，看重魏晉六朝的作品，過於唐宋，更不必說「八大家」和桐城派。中國佛經有許多種都是唐以前譯出的，因此可以算是六朝的作品，他便以這個立場來加以鑑賞。²⁸

如果比照周作人先生另外在 魯迅的國學與西學 一文中的說法，我們隱約可以窺見魯迅先生對傳統中國文學觀點——「文以載道」的排斥²⁹，所以像是唐宋古文、桐城文章，這類以道德義法為主的文章，都為魯迅所排斥，所以使他能將眼光放在主流之外的地方，發現魏晉文章的好處。

²⁷ 周作人：地方與文藝 《周作人全集》（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9。

²⁸ 周作人：魯迅的文學修養 《魯迅的青年時代》（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1 月），頁 55。

²⁹ 魯迅的 摩羅詩力說 一文，這樣的觀點也表現的很清楚，說到：「如中國之詩，舜云言志；而後賢立說，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無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強以無邪，即非人志。」魯迅撰此文的時候，周作人本身也寫了 論文章之意義暨其使命因及中國近時論文之失，同樣是反對「文以載道」的傳統觀點，可參。

三、魯迅的文風與魏晉遙契

喜愛魏晉人物、魏晉文章之外，實際上魯迅先生本身文章風格，也被稱為「魏晉文章」。以下就來談談關於魯迅先生的文章風格。我們知道一個人可能在言語上做偽，說著言不由衷的話，然而若真下筆為文，且這個「文」，指的不是專為應付他人，或別有用途而書寫，而是真正寫出自己的意見，它所展現出來的東西，常常騙不了人。因為，一個人在面對白紙的「心聲」，正顯示他心靈自我選擇過後的定位，以及其性格、秉氣自然的發抒，單是行文氣勢的起伏，還有用字所營構出的精神世界，乃至於字體本身，便隨著不同的個體，有著多種不同的風格。

而魯迅先生文字變化多端，有奇偉如：「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而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有中得救」；有理直氣壯如「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用字之簡鍊，變化之多，格外有種韻味。且拿一段評論胡適先生與魯迅先生的行文風格之話語來看：

「胡適之體」是高頭講章，洋洋灑灑不檢束，處士橫議而不自顧其形，侃侃如牧師之佈道和紳士之教訓。「魯迅風」則如怨如慕，時而泉流幽咽，弦凝冷澀，時而如鐵騎突出，銀瓶乍破，絕望之至生希望，痛恨之極含熱愛，壓抑深重而反抗愈烈，無言沈默又常在沈默中爆發；這是奴隸的顫叫，是天涯孤客的不平之鳴，是夜晚潛行的話語³⁰。

³⁰ 郜元寶：《魯迅六講》，（上海三聯書店 2000 年 10 月出版），頁 92。

盛大士《與李海帆觀察論文書》有云：「夫文章之道通達萬變，而各隨其人之情性以出。其人狂則其文高明而俊偉，其人狷則其文廉直而勁正，其人剛則其文發揚而蹈厲，其人柔則其文恭敬而溫文。」魯迅先生的確在文字上表達，創造出了一不可模仿也無法追隨的典範，許多人咸皆認為魯迅行文頗有魏晉文章的風格，則是事實。最佳例證是劉半農曾經贈魯迅先生一幅聯語，上面寫著：「托尼學說，魏晉文章」，簡潔有力的八個字，概括了魯迅先生的思想與文章風格：「魯迅的思想受到托爾斯泰和尼采的影響，在文章的風格氣韻，則與魏晉文章的精神相繼承」，而這樣的禮物，據說，當時魯迅先生的朋友都認為十分妥適，頗能貼近魯迅先生為文與思想上的風格與取法對象，不過魯迅先生本人雖沒有發表意見，至少是不加反對的。郭沫若於《魯迅詩稿》³¹序文中：「魯迅先生亦無心作書家，所遺手跡，自成風格。融冶篆隸於一爐，聽任心腕之交應，樸質而不拘攣，灑脫而有法度，遠逾宋唐，通攀魏晉。以之寶之，非因人而獎也。」

楊澤先生也說：「劉半農曾以『托尼學說，魏晉文章』形容魯迅。托爾斯泰晚年秉持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反教會反沙皇，勇於替俄國農民及所有『被壓迫者』說話；拿他來對照魯迅反體制及悲天憫人的一面，其實十分貼切。另一方面，由於私淑嵇康和尼采，魯迅的確兼有魏晉文章的『清峻』、『通脫』，以及尼采最富批判廓清性格的道德哲學。事實上，魯迅散文不僅繼承了尼采道德系譜學的解構觀點，同時也經由尼采，間接地與西方散文的『道德家』傳統接上了線。這裡的『道德家』並非一般以為的『道學家』或『道德主義者』。狹義地說，『道德家』指的是，包括巴斯卡、拉芳登、拉羅希富在內，一群十七世紀法國散文家。」³²不過，關於魯迅先生本人為文被稱之「魏晉文章」，亦有人提出反對之見，以為劉半農先生所言之「魏晉文章」，並非專指魯迅先生文章中的魏晉風格，認為這是從中西方各拿出魯迅所

³¹ 《郭沫若》（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4年11月），頁188。

³² 楊澤：《恨世者魯迅（下）》《聯合文學》1996年3月，頁136。

認同的點，做對照參照，而「魏晉文章」是魯迅先生本身思想對照的中國主軸；然而即使如此解釋，同樣可以佐證魯迅先生與魏晉的關係。

最後是有關魯迅先生對於魏晉古籍之蒐集。據考訂現編定的古磚拓本輯集《俟堂專文雜集》，其中漢魏六朝的佔了一百七十件；何晏、王弼的釋本，藏有何晏的《論語注疏解經》和王弼注《道德經》。特別是《嵇康集》，用力最甚，不惜要自費印行《嵇康集》³³。除此之外，魯迅先生更兼及南北朝佛學方面的興趣，他這方面佛典的收集頗為豐富。「一九一四年前後，魯迅購入佛教著作近八十種 與上述印度佛經並存的魯迅藏書，還有中國的佛教哲學著作，屬於魏晉南北朝的有《肇論》、《弘明集》。後者對魯迅產生過至關重要的影響。」³⁴而魯迅先生之所以看重於《弘明集》者，不是為佛教辯護之文章，而是其論辯挑戰的文章，把他當作六朝文一樣地吸收。從字體、文章風格氣韻、詩作、收集散佚古籍的興趣，可說明魯迅先生對六朝之特別興趣。

魏晉為甚麼能夠得到魯迅先生這般的青睞與追仿呢？這份情感的源頭究竟是甚麼？是內在生命對於魏晉時期氛圍的無法拒絕地召喚？還是像有人認為的那樣，魯迅先生「發思古之幽情」，為了是他所生活的現代，歷史在中輪迴轉動它的巨輪，往往有其可供取法之處？到此為止綜合來看，可證魯迅先生與魏晉的聯繫至深，實非穿鑿附會的後世想像，而是確有證據以資我們憑藉。是以魯迅先生與魏晉之間的基調相合，這應當是魯迅先生能提出「文學自覺觀念」重要的前提，又可證魯迅先生身上與魏晉名士的一種生命之投合，以及他個人所顯現

³³ 根據《魯迅全集 魯迅著譯年表》(1981年版)載，魯迅於1913年10月首次校《嵇康集》，並作《嵇康集》；後於1915年7月，1921年2-3月，1922年2月連續多次校《嵇康集》；1924年6月再次校《嵇康集》，並作《嵇康集 序》《嵇康集 逸文考》《嵇康集 著錄考》等文，完成了他校《嵇康集》的第四個工作本。1926年魯迅應廈門大學《國學季刊》之請，又作《嵇康集 考》。1931年，魯迅在上海又校《嵇康集》，算作『清本』，但他並不以此為最終結束，直到1935年9月(逝世前一年)給台靜農先生覆信時，仍認為他的清本應當校印。

³⁴ 據張杰《魯迅及中國古代哲學著作(下)》一文，《魯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6期。

出來的種種與「魏晉文化」之間的感應，此關聯性並非虛妄。我們知道歷史人物、歷史文本，對於個體的生命而言，常常顯現為一種原型與對話的召喚，每個人都會選擇與自己生命問題冥契之對象，進行自我溝通、對話，以撫平於人世的灼傷與膠著，魯迅本人的精神稟氣是與魏晉時期靠得很近的，而正所謂心有所愛，不忍頹敗，熱情總是照亮著人們走進一條「發現真理」的康莊大道上，陳平原先生從學術史的脈絡底下，說明了魯迅先生在對魏晉的判準，尤其是「文學自覺」是前所未有的：

認定魏晉是中國歷史上「很重要的時代」，「能充分容納異端和外來的思想」；欣賞嵇康、阮籍的「師心使氣」，敢於「與古時舊說反對」；尤其是將其作為「文學的自覺時代」來把握，更是言前人所未言。³⁵

這提醒了我們一點，一直以來能夠珍重魏晉時代之價值者並不多，特別是在魯迅先生對於此時期的文化、文學的判準，也構成理論性的權威指導，從而根深蒂固地影響後人的認識與評價，因此今天，回顧魯迅先生與魏晉之間的聯繫乃是絕對必要的³⁶。

³⁵ 陳平原：《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台北麥田出版社，頁97。

³⁶ 學者王瑤的《中古文學史論集》在1981年《重版後記》中談到其本身研究中古文學史的方式，是深受魯迅《魏晉風度及文學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的影響，他說：「這裡只想談談魯迅著作對我的教益。由本書的內容可以看出，作者研究中古文學史的思路和方法，是深受到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的影響的。魯迅對魏晉文學有精湛的研究，長期以來作者確實是以他的文章和言論作為自己的工作指針的。」

第二節 魯迅提出「文學自覺觀念」之 學思基礎

佛洛姆曾說：

如果一個人要問自己，他是怎樣對那些決定要在他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思想領域發生興趣的話，那麼，他就會發現，要簡單地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並非是件容易的事情。或許，他天生對某種問題就有一種愛好；或許，他是受了某些老師的影響，受了當時各種思想或個人經歷的影響，才走上了他以後所感興趣的道路的——然而，又有誰知道，在這些因素中究竟是哪些因素決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呢？³⁷

人處乎世，無時不刻不在面臨抉擇，可以說，人生即是選擇，存在主義認為「人是偶然性被拋擲到這個世界上來的」，是無家可歸的「宇宙孤兒」，在這佛家所說「起於無明的世間」奔波忙碌，人總是在和大大小小的選擇面對面，有些瑣瑣碎碎、有些則可能一選擇即扭轉了個人生命的面貌，生命無法回頭，而一般人往往「百姓日用而不知」，就這樣走向了終點。然而，對於偉大的人物而言，他們的一生並不完全僅屬於他們自己，同時必須為其它人所借鏡與取法，甚至成為世界遺產的一部份，他們對於生命的態度，從「飛揚激昂的成就」乃至於「人性的陰暗」與「偉大的背面」，都必須毫無遺漏地呈現在世人面前。因此，他們的思考脈絡也時常成為後人討論的焦點。

魯迅先生以「文學自覺」之說目前廣為人所接受，其提出「文學

³⁷ 佛洛姆：思想自傳——我所理解的馬克思和佛洛伊德，引自《心靈簡史》（線裝書局）2003年9月，頁192。

自覺觀念」的基礎需要就學思方面加以探討，尤其在學術意見上，多數人的意見都是前有所承的，因此就從魯迅先生的「學思基礎」脈絡底下討論他的「文學自覺觀念」是從何而出，是有必要的。在這裡我們進行的方式，主要借助「發生在章氏身上種種與魏晉文之關係」之探討，以章氏個人的基本資料，以及他贊譽魏晉文的一些文獻，看章氏喜愛魏晉文的背後，包含了怎樣的個人背景、因緣？並從這些資料當中，試圖去了解這個影響魯迅先生欣賞魏晉文的老師，他與魏晉文之間屬於甚麼樣性質的遇合？章太炎先生又如何理解魏晉文的內涵？他欣賞魏晉文的是哪些部份？乃至於魯迅先生受到章太炎先生對魏晉文的具體影響是甚麼？觀察章太炎先生究竟是如何影響了魯迅先生對魏晉文的喜好，並期望在爬梳了上述問題之後，可以了解魯迅先生從章氏身上，獲得了怎樣對魏晉文的印象與概念。

一、章太炎對魯迅提出「文學自覺觀念」之影響

究竟在魯迅先生的學思歷程當中，是誰真正地影響了他提出「文學自覺觀念」的呢？這或許不能簡單的得到出一個結論。不過，要是說魯迅先生與「魏晉文學」的緣份，是受到誰的影響而結下的？那麼恐怕我們就不能忽略魯迅先生與章太炎先生之間，在歷史上為人所熟知過的一段師生情誼。王瑤先生為大陸治中古文學之著名學者，其治中古文學深受魯迅先生之影響，他指出魯迅受魏晉文之影響，關鍵在章太炎先生的影響：

魯迅受魏晉文影響，而接受的契機在於從太炎問學，這點已成

學界共識。³⁸。

而陳平原先生在《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亦云：

魯迅對佛學的興趣、對魏晉文的欣賞、對莊子的推崇、對儒家學說的批評、對滿清統治治術的揭露，乃至治學中注重小學、金石和歷史等，在在可見章太炎的影響。

從以上的兩段資料，都可見目前學界將魯迅先生與魏晉文之因緣，認定為章太炎先生對他的影響。那麼以下我們就試從章太炎來看看究竟王瑤先生所謂「章氏影響魯迅欣賞魏晉文的具體層面」為何？

（一）章太炎門下學風對魯迅之影響

章太炎先生（1869-1936），字枚叔，號太炎。浙江餘杭人，家中藏書豐碩，幼年隨外祖父朱有虔讀經時，朱氏便以明清遺事對章氏耳提面命，朱氏教導對章氏一生影響甚大，使其從小便決意放棄仕進之途，謙稱「予小多病，因棄八股，治小學，後乃涉獵經史，大概自求為多」，但可知日後從事革命之意念實由此醞釀、發萌。初名「學乘」，後因慕顧炎武之為人，改名「絳」，後又改為炳麟。年方十六，便通覽《史記》、《漢書》，為學刻苦。後秉父遺訓，赴杭州八年，師承俞樾，而後肄業於詁經精舍。一生見國憂內亂，除國學之外，多接觸新學及革命的思想，是國學、西學兼擅的大師。魯迅先生因為章太炎先生強烈的革命色彩對其風格、學問極為仰慕。

³⁸ 現代中國散文之轉型 《文學史第三輯—詩學研究》，（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參閱王瑤《論魯迅作品與中國古典文學的歷史聯繫》第二、第三節。

章太炎先生以多聞的博通家為名，當時慕名前往聽講的青年知識份子極多，不只魯迅先生，乃至周作人先生、許壽裳先生、錢玄同先生、黃侃先生等都曾在其門下聽課，因此章太炎先生此種尊崇魏晉文章的態度，對於門下弟子的影響也頗令人玩味³⁹，其門下弟子不管是潛移默化，還是耳濡目染，都應該達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從黃侃先生說他：「持論議禮，尊魏晉之筆」可見一斑。龔鵬程先生云：

從章太炎所影響的新舊派門人身上，我們都不應該忽略這獨崇魏晉、上追六朝文風乃至學風的意義。例如舊派的黃侃，對《文選》極為用功，又作《文心雕龍札記》，寫駢儷文，撰《漢唐玄學論》，顯然浸淫五朝學至深。新派的魯迅，也是以「魏晉文章」著名，對《嵇康集》及六朝碑拓等，下過很多功夫。甚至整個五四文學革命，劉大杰都曾表示它與魏晉文學具有相同的精神。⁴⁰

打個比方來講，章太炎先生就曾將得意門生黃侃比做阮籍，1909年章氏為黃侃撰文《夢謁母墳圖題記》中說：

蕪州黃侃少承父學，讀書多神悟，尤喜音韻，文辭澹雅，上法晉宋。雖以師禮事余，轉相啟發者多矣。頗好大乘，而性少繩檢，故尤樂道莊周。昔阮籍不循禮教，而居喪有至性，一慟失血數升。侃之念母，若與阮公同符焉。

又以為季剛之為人可入《新世說》：

得書為之噴飯。季剛四語，正可入《新世說》，於實事無與也。

³⁹ 黃侃曾作《仿庾子山詠懷》：「此日窮途士，當年遊俠人。」

⁴⁰ 龔鵬程：以章太炎為線索論晚清到五四的文化變遷《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學生書局，1980年），頁8。

然揣季剛生平，敢於侮同類，而不敢排異己。昔年與桐城派人爭論駢散，然不罵新文化。今之治烏龜殼、舊檔案者，學雖膚受，然亦尚是舊學一派，此外可反對者甚多。發小狍而縱大兇，真可怪也。勸之必不聽，只可俟後世劉義慶來為記述耳⁴¹。

不只如此，章氏率領其弟子進入北大，造成勢力。周勛初先生曾說：「清朝末年，民國初年，桐城派的最後幾位大師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和林紓等人先後曾在京師大學堂及其後身北京大學任教，其後章太炎先生的門人黃侃、錢玄同、沈兼士、馬裕藻及周氏兄弟等先後進入北京大學，逐漸取代了桐城派的勢力」⁴²；又「章氏文學重魏晉，其弟子中也有多人愛好魏晉六朝文學，於是在桐城派占上風的地盤上楔入了新的因子。民國六年，劉師培擁護袁世凱稱帝失敗，章太炎又改薦他至北京大學任教。於是《文選》派中人物逐漸排除了桐城勢力。」⁴³，而劉師培先生位這重要成員的加入，則更促使桐城派的加速衰敗。

對於桐城文派的批評，若只是像陳衍那樣風言風語旁敲側擊，倒也無大礙。可章門弟子卻是斧底抽薪，迅速佔領「大學堂的陣地」。將教育權利與文派爭辯糾合一起，使得學術思潮與主流話語的轉化迅速完成。短短幾年，北大已由桐城文派的大本營，轉為以提倡魏晉六朝文著稱。先是黃侃進入北大，講授《文心雕龍》(1914—1919)，後又有劉師培歸隱上庠，主講中古文學史(1917-1919)，二人攜手，顛覆了以唐宋八大家為盟主的文學史想像。⁴⁴

⁴¹ 吳承仕：十月二三日章答吳書，《章炳麟論學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黃侃之《阮步兵詠懷詩箋》也流露對於阮籍之同情：「阮公深通玄理，妙識物情，詠懷之詩，包羅萬態，豈僅厝心曹馬興亡之際乎？跡其痛哭窮路，沉醉連旬，蓋已等南郭之仰天，類子輿之鑿井，大哀在懷，非常言所能喻，故一發於詩歌。」引自學海出版社印行本之序言。

⁴² 周勳初：《文心雕龍札記》序，黃季剛先生《文心雕龍札記》的學術淵源。

⁴³ 周勳初：《文心雕龍札記》序，黃季剛先生《文心雕龍札記》的學術淵源。

⁴⁴ 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新教育與新文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頁125。

結合前述章門弟子進入北大後展開的「六朝文」與「唐宋文」的較量可見，我們可以想像魯迅很有可能正是在這一段時間裡，與提倡「六朝文」的章門弟子頻繁往來，攀談、宴飲、贈書，關係相當密切。且魯迅後來投注更多的心血去發掘魏晉時代的文化底蘊，顯然是與北大文科的那場較量息息相關，不過自己還別有所側重罷了，所以既然在章氏底下，他的弟子也多因其師之故，而對魏晉時期有所關注。

（二）章太炎推崇魏晉文章對魯迅之影響

章太炎先生為何會欣賞魏晉之文呢？我們知道晚清學人身處在桐城派當道之際，早年文章多受桐城派之影響，章太炎先生也難自外於這股桐城勢力之外。但是，但是在這樣的情況底下，章氏並未為桐城義法所拘，困陷於桐城文，反而很快地看破桐城派的手腳，他曾說：

江淮間治文辭者，故有方苞、姚範、劉大櫟，皆產桐城，以效法曾鞏、歸有光相高，亦願尸程、朱，為後世謂之桐城義法。戴震為《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材性，學者自是疑程、朱。桐城諸家，本未得程、朱要領，徒援引膚末，大言自壯，故尤被輕蔑。

可知章氏學文先師桐城而後輕之，其實這現象，不獨章氏如此，譚嗣同也有類似的情形：

嗣同少為桐城所震，刻意規之數年，久自以為似矣。出示人亦以為似。誦書偶多，廣識當世淹通歸一之士，稍稍自慚又無以

自達。或授以魏晉間文，乃大喜，時時籀繹，益篤嗜之」可謂當時之共相⁴⁵。

蓋文人在學習之歷程當中，述學文體往往需要多年氣候的累積，少有終身不變，早成氣候者，因此多半前後有所移轉，是十分自然之事，章氏在中國文學傳統中也曾轉益多師，進出於幾種不同的進路之中，對於資源的擷取上，也展現出嘗試的多變性，然而，章氏後來在對魏晉文風的傾慕，此一轉變，常為人所提及。據章氏自己的說法，他至三十四歲開始，將眼光轉向魏晉之文，此一轉變一直為人所津津樂道。

引起我們好奇的是，雖然章氏到後來轉向對「魏晉之文」的尊崇，但當他從桐城派中退出之前，也曾在另一個選擇——選學中徘徊，並非馬上與魏晉文章遇合，在此之前，學過韓愈之奧衍不馴，後又轉到汪中等「浮華靡麗」面前繞了一圈，但是到了最後，也不認同所謂的駢文正宗。章氏發現「追尋文采的飛揚與華美」與「文以載道」，這兩個極端都不是他所想要的，到了最後「三十四歲以後，欲以清和流美自化；讀三國兩晉文辭，以為至美」，「由是才體裁初變」。⁴⁶在這當中，章氏曾面臨怎樣的心理轉折，到最後又為何選擇魏晉文章，為其取法之對象？是一個值得了解的重點。

首先，從章氏的文章當中，欣賞魏晉文之言論，可謂屢見不鮮，或許從這些言論當中，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章氏曾認為中國文學傳統資源最可取者為「漢晉文章」：「詩至清末，窮極矣。窮則變，變則通；我們在此若不向上努力，便要 向下墮落。所為向上努力就是直追漢晉，所謂向下墮落就是近代的白話詩，諸君將何取何從？」⁴⁷，又曾讚漢晉之文，「任意舒卷，不加雕飾，真如飄風湧泉，絕非人力

⁴⁵ 譚嗣同：《譚嗣同全集》，三十自紀，（北京市：三聯書店，1954年）。

⁴⁶ 章太炎：自述學術次第。

⁴⁷ 章太炎：《國學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頁66。

⁴⁸」對於漢晉之文獨特氣質，賞愛不已。

而章氏更將魏晉文章上擬晚周，可以說對之推崇到了極點，「或言今世慕古人文辭者，多論其世，唐、宋不如六代，六代不如秦、漢，今謂持論以魏、晉為法，上遺秦、漢，敢問所安？曰：夫言亦各有所當矣。魏晉之文，大體皆埤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⁴⁹在這一點上頭將「魏晉之文」與「晚周」相提並論，後來王夢鷗先生也曾經稍稍提及：「魏晉南北朝之間，濟濟多士，由他們發展而成的文學，不僅有其長遠的影響力，足與周秦文學分庭抗禮。」⁵⁰。不過很重要的是，為何章氏會給予魏晉之文如此高的評價呢？我們仔細留心「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已經可知章氏之所以沒有像阮元等人，因為排斥桐城文章，而走到極端重視文采的文學觀念，跟他本人的文章典範之追求終極理型有關。

我們都知道章氏早期是以革命文字出名的，甚至被目為「章瘋子」，1906年《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曾說：「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後，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得到。」正因為敢為人所不敢為，使得他所寫的一些論爭性的文字，就連魯迅先生都極為傾心，更不用說在當時人眼中看來，自也是頗具張力，又十分令人神往的。尤其他又有革命者與學問家的雙重身份，革命之激昂需要富於說

⁴⁸ 此為其推崇王弼、嵇康、裴頠等人的文字。

⁴⁹ 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頁84。

⁵⁰ 王夢鷗先生於《魏晉南北朝文學之發展》一文當中曾說：「在事實上，魏晉南北朝之間，濟濟多士，由他們發展而成的文學，不僅有其長遠的影響力。足與周秦文學分庭抗禮。抑且對於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認識，亦遠較前代為深入，甚或可說是於文學發展上，盡其有本有末的工夫了。」收於羅聯添先生所編《中國文學史論文精選》，（學海出版社，1984年），頁342。

理性的文字加以點燃，然而兼具學問的章太炎，也不能滿足於只是一味地為說理而說理，如此則彷彿失去韻味。所以，他對於魏晉文的欣賞，除了受到其中論辯色彩之成份的影響，而且更重要的是，欣賞魏晉之文所煥發出來的一種清新與氣度，對於在桐城派文學環境下成長的章太炎，無疑有種吸引力，或許在他心目中，是將魏晉之文作為自己擅長之論證文字的典範。

我們可以知道，章氏是為了在自己革命的激昂與學問的累積，兩種不同的生命面向上，企圖找到一種平衡，所以能跳出清代駢散之爭，一方面超越桐城派之觀點，欣賞被桐城派同列八代之衰的魏晉文；另一方面又不流於選學對八代駢文的極端強調。可以說章氏是紮紮實實地在文章追求上，找到了獨一無二的原鄉。這應該也是爾後錢穆先生表彰章太炎先生論學文字的原因，錢先生曾說：「鄙意論學文字極宜著意修飾，近人論學，專就文辭論，章太炎最有軌轍，言無虛發，絕不支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搖曳，可為論學文之正宗」⁵¹。陳平原先生也說：「直到晚年講學蘇州，太炎先生仍堅持其對魏晉六朝文的獨特發現。而這一發現，經由周氏兄弟的引申與轉化，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散文的一大景觀」⁵²就可見章氏找魏晉文，是一種終身的信仰。

章氏推崇魏晉之文，還包括他喜歡作在魏晉時開始盛行的五言詩，他曾說：「余作詩獨為五言。五言者，摯仲洽文章流別本謂俳諧倡樂所施，然四言自風雅以後，菁華既竭，唯五言詩猶可仿為。余亦專寫性情，略本鍾嶸之論，不能為時俗所為也。」⁵³可見章氏對南朝文學理論專著也頗熟悉，此外，章氏更批評漢、唐文學，以凸顯魏晉文章之好，如：「老莊形名之學，逮魏復作，故其言不牽章句，單篇持論，

⁵¹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 附錄，（三民書局民國八十年十月），頁 253。

⁵² 陳平原：《國故論衡》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頁 17。

⁵³ 章太炎：《太炎先生自訂年譜》，（臺北：文海 1971）。

亦優漢世。」⁵⁴在這裡他認為魏代文章是優於漢世的，還有：「夫雅而不核，近於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於彊鉗；肆而不制，近於流蕩；清而不根，近於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無其病者，莫若魏晉。」⁵⁵仍是秉持著同樣的想法。

章氏認為要說到儷語，不該只將眼光放在清代的汪中，還應上看至晉代，以晉人為宗：「今人為儷語者，以汪容甫為善，然猶未窺晉人之美，彼其修辭安雅，則異於唐；持論精審，則異於漢；起止自在、無首尾呼應之式，則異於宋以後之制科策論。而氣息調利，意度沖遠，又無迫笈蹇吃之病，斯信美也。」⁵⁶一共指出「修辭安雅」、「持論精審」、「起止自在」、「氣息調利」、「意度沖遠」等晉代文學中多項優點。乃至於對單一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家，章氏也時有深入地評論：「夫觀王粲之從軍，而後知杜甫卑門也；觀潘岳之悼亡，而後知元稹凡俗也；觀郭璞之游仙，而後知李賀詭誕也。淡而不厭者陶潛，則王維可廢也；矜而不寔者謝靈運，則韓愈可絕也。」⁵⁷在這裡將六朝的優秀詩人及作品與唐代相比，言論相當偏激，在後人看來可能會覺得章氏何苦貶抑唐代文學若是，但其出發點卻不是惡意的攻訐，只是為了突出六朝文學作品亦有可觀之處。

在自述學術次第一文中，章氏曾說：「余既宗師法相，亦兼事魏晉玄文」，這裡有些意思可供我們去想像。據說，章太炎接觸佛學是因「蘇報案」下獄的時候，相傳他在獄中開始真正潛心研讀佛典，主要讀的是 瑜珈師地論、因明論、唯識論 等大乘教義典籍⁵⁸。

⁵⁴ 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頁82。

⁵⁵ 章太炎：《國故論衡》，論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頁85。

⁵⁶ 章太炎：《章氏叢書》，薊漢微言。

⁵⁷ 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頁90。

⁵⁸ 章念馳：章太炎與佛教的關係及其佛學特色。「他將佛學與儒學、玄學、西學一一相較，發現華嚴宗和法相宗，與他所研的樸學十分近似，樸學注重煩難的名物訓詁考據，與唯識宗思辨精細如一。」

而前面「法相」與「魏晉玄文」兩者同時提到，其共通處指向章氏所重視的一個關鍵之處，近人郭延禮曾說「以古文經學家而推崇玄學、佛理，除了章氏的反叛意識、哲學興趣以及個性主義追求，還有就是對名學的共同嗜好。而章太炎推許魏晉文章『綜核名理』，『誠有秦漢所未逮者』，這與他認準『科學興而界說嚴』，不滿『中國文辭素無論理』大有關係」郭氏的推測並不是沒有根據的，章氏在《答鐵錚》一文說：

僕所以獨尊法相者，則自有說：蓋近代學術漸趣實事求是，自漢學諸公分條析理，遠非明儒所能企及，逮科學萌芽，而用心益復縝密矣。是故法相之學，於明代則不宜，於近代則甚適，由學術所趣然也。⁵⁹

正說明了其之所以特別「獨尊法相」，有兩個原因，第一個理由符合據他所觀察的「漢學諸公分條析理」以及「科學萌芽而用心益復縝密」學術大勢；而其欣賞魏晉之文也是同理可證。且章氏本身治樸學，又專創語言文字之學，這也與魏晉之文細密思辨的思路頗為接近，所以他認定魏晉文中名理的成分十分可取，一拍即合並不奇怪。並且，「章氏看來，世人之所以只能『出入風議臧否人群』，而不能『甄辨性道極論空有』，就因為忘了魏晉玄文。」⁶⁰。陳平原先生說章氏吸收魏晉之文，一是因其辯智闔達，浸淫反於九流，一是因其敢於摒棄功利，殫殘聖法。而這兩點，無疑均為魯迅先生所激賞與接納。

（三）魯迅對章太炎意見的吸收與轉化

⁵⁹ 郭延禮：《近代西學與中國文學》，（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0年4月），頁280。

⁶⁰ 陳平原《中國大學十講》新教育與新文學，（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頁129。

但是，雖然章太炎先生喜愛魏晉之文，但他所稟持的泛（雜）文學觀：「凡云文者，包絡一切著於竹帛者而為言，故有成句讀文，有不成句讀文，兼此二事，通謂之文。」⁶¹使得他固然推崇魏晉之文，然而，所欣賞的對象，主要卻不是我們現在所以為的六朝文學，而主要帶有嚴密邏輯色彩的玄學文章，這一點是值得我們留意和仔細辨明的。他曾說：

余以為持誦《文選》，不如取《三國志》、《晉書》、《宋書》、《弘明集》、《通典》觀之，縱不能上窺九流，猶勝於滑澤者。嘗與人書，道其利病，曰：「文生於名，名生於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謂之知文。小學既廢，則單篇擱落；玄言日微，故儷語華靡。不埒其本，以之肇末，人自以為楊、劉，家相譽以潘、陸，何品藻之容易乎？」⁶²

在這裡我們發現，其實章太炎先生基本上是持著「重史學」「輕文學」的態度，一般而言，人們談及六朝之文，多半指的是詩歌等文學作品，《文選》更是在中國文學史上不可不讀的重要著作，但章氏卻大膽的說，讀《文選》還不如看史書以及像《弘明集》的佛教著作，可見他之前雖然認同六朝作家優於漢、唐之世的作家，但其最看重於六朝時期的絕非是像阮元或劉師培等人，有關「辭藻」、「駢文」等具有文采美的部份。可以知道章氏最看重六朝的第一是學術。

章氏重學術的表徵又可從他重玄學之言論，再得一佐證。我們發現在「五朝學」一文當中，章氏說：

玄學者，固不與藝術文行牾，且翼扶之……其言循虛，其藝控

⁶¹ 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4月），頁52。

⁶² 章太炎：《國故論衡 論式》。

實，故可貴也。⁶³

這段話對於目前研究六朝文學，是很有其意義的，「章氏指出魏晉玄學，『其言循虛，其藝控實』，對當時各種學科所獲得的成就，做出了哲學總括。它雖然失去了各學科直接的現實的品格，但卻可以統攝一切學科的基本規律。因此，它不僅不妨礙文學的發展，而且還有力地推動了文學的進步。太炎此論，對我們今天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和文學理論、審美觀念的進步也是富有啟示性的。目前觀之，從玄學切入探討六朝文學，章氏是第一人」⁶⁴。

總而言之，章氏對六朝之文的推崇，其重心絕非我們今日所認識的六朝詩歌，而是六朝的學術文章，這是一件十分可肯定之事了。那麼，何以章氏對六朝時期的學術文章如此看重呢？沈家庄先生《章太炎文學思想略論》一文中，對章太炎此種態度有透析之論，他解釋何以章氏重玄學史學而不重文學，與其「學術性格」、「學術理想」有密切之關聯：「一是由於章太炎推崇玄學，尤重大而博的學術，不以專擅形象與情韻之文學為重。二是由於章太炎對史學情有獨鍾，由『經世致用』的實踐論學術原則出發，遂認為形象和情韻意義上的文學乃屬『滑澤』之倫，遠沒有史學文章那麼高的價值。」這實在是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參考。

只可惜的是，目前一提到章太炎先生的文學觀念，大家都忽略了章氏與魏晉文的密切關係，近代文學研究者多半將之歸為文學革命的洪流中，極端復古派，很少察覺他與魏晉之文的關係：「章炳麟的復古把文的概念回復到先秦時期，他所說的先秦時代『文』的概念並不錯，但這一復古實際上否定了 2000 多年來文學觀念的發展與進步。章炳麟的藝術感覺很好，又有深厚的學術根基，但是他把『文』的範圍定得

⁶³ 章太炎：《五朝學》《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頁 75。

⁶⁴ 黃保真等人著：《中國文學理論史》（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94 年），頁 302。

如此寬泛，無所不包，結果也就難以總結出文學的特殊規律。復古影響了他對文學的認識深度這是很可惜的。」⁶⁵這對於章氏的文學觀了解是流於平面化的。其實章氏對於魏晉文認識的獨特性是具有超前意義的，此一意義促使了魯迅先生對於六朝文學的帶動，這條隱形的線索如今勾勒出來以後，我們實在不能厚誣章氏文學觀是極端「不進化」的了。

黃錦樹也曾提到章氏的文學觀並不如表面上看來如此片面：「討論、理解章太炎的文學觀念十分容易也十分困難。這麼說是因為要把它處理得很容易也可以，運用『解釋不足』的方式，以羅列、分類、歸納再加以描述即可；而困難也就在於，如果不先理解章太炎思想和精神狀態的『大體』，以之為基礎，則根本無法理解章太炎為甚麼會有那樣的文學構想。而太炎對於文學的構想，其奧秘也正在他的『根柢之學』（樸學、古文經學、小學）上。在《國故論衡 文學總略》中，太炎開宗明義：『文學者，以有文字箸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這段文字直可看做章太炎文學觀的一則總綱領，相當嚴密的把各個關鍵要素和它們之間的關係扼要的展示。四個要素：文字、箸、竹帛、法式。『文字』太炎把它納入小學的範圍；『箸』指書寫行為，關涉的是書寫者的道德、情志，因而不（只）是書寫行為，而是何以書寫、何以不得不書寫；『竹帛』泛指文字的物質載具，文字依它以顯形；『法式』指篇章字句甚至字本身的構造原則，通向『治經之法』。更值得注意的是，太炎在這一綱領中選擇了他本身所能接受的最古老的物質載具：竹帛（他不承認龜甲），因而這一綱領其實有一層更深的含意；它表徵出一種初始的狀態，就太炎的思想特徵而言，無妨稱之為『文始狀態』。」⁶⁶這又再次提醒我們不可太過輕易且不友善的理解章氏之文學觀念。

⁶⁵ 袁進：《近代文學的突圍》，（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頁 190。

⁶⁶ 黃錦樹：《章太炎語言文字之學的知識（精神）系譜》，淡江大學碩士論文 1994 年 6 月。

我們在這裡花了好長一段時間，費心介紹章太炎對魏晉之文的喜好，以及其喜愛魏晉之文的原因，但是，無論如何，很重要的一點，雖然章氏的文學觀並不是想像中的如此沒有價值，但他無法為魯迅所接受卻是事實，師徒兩個人不同的文學觀念，便使得他們在同樣接受魏晉文的與欣賞對象、理解角度，以及挖掘內涵上，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許壽裳先生就說：

魯迅聽講，極少發言，只有一次。因為章先生問及文學的定義如何，魯迅答道：「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先生聽了說：這樣分法雖較勝於前人，然仍有不當。郭璞的《江賦》，木華的《海賦》，何嘗能動人哀樂呢？魯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說：先生詮釋文學，範圍過於寬泛，把有句讀和無句讀的悉數歸入文學。其實文字和文學固當有分別的，《江賦》、《海賦》之類，辭雖奧博，而其文學價值就很難說。

67

章太炎先生也把魯迅先生的見解，他在課堂上師生間的答問，記錄下來，並稱魯迅先生對文學的看法是「一往之見」，頗有不以為然的味道：

或言學說、文辭所由異者，學說以啟人思，文辭以增人感，此亦一往之見也。⁶⁸

有鑑於此，我們可以歸納出這樣的結論：章太炎先生對魯迅魏晉之文的影響，其大部份是引起他對魏晉文的「熱情」與「興趣」，而不在於具體的意見上，比如章氏特重魏晉時期的學術文章，實質上並不

⁶⁷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摯友的懷念——許壽裳憶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5 月），頁 17。

⁶⁸ 章太炎：《國故論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 4 月），頁 52。

是魯迅先生所認同的文學內涵，魯迅先生或者也感到魏晉之文的論辯氣質，可與自己寫雜文時相契，但是魯迅先生更關注的乃是魏晉時期文人生活苦悶的種種典型現象，比如服藥與飲酒等，其所側重的也是魏晉社會與文學之間的互相聯繫，這都是由於魯迅的文學觀較接近近代文學觀點所導致的，因此魯迅對於魏代的文學現象，注意到了像是詩賦、《典論 論文》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但是，章太炎先生對魏晉文章的推崇，再加上早年章太炎先生與魯迅先生密切的師生關係，而章太炎先生帶領門下弟子對魏晉文章的喜愛，共同帶動了魯迅先生對於魏晉時期的愛好，促使魯迅先生閱讀了大量的魏晉文章，啟發了他以後的研究魏晉文章的志趣，這才是章氏對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最深最大的影響。

魯迅先生曾說：「戰鬥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業績。」這種適宜論戰的雜文寫作，不僅需要思路清晰、文字犀利的功力，更需要一種切中要害的簡約，這種寫作所須的資源都可以從魏晉文章的傳統中去汲取營養，而章太炎先生和魯迅先生正是都看到了這一點。魏晉文體到了魯迅先生手中，得到了真正的發揚光大，並把它推向了極致。更重要的是章太炎說：

晉代文學和漢代文學，有大不同之點。漢代厚重典雅，晉代華妙清妍，差不多可以說一是剛的，一是柔的。⁶⁹

由於章氏以「剛」、「柔」區分漢、晉兩大文學之間的文學，突出了漢代與六朝文學在特質上的大不相同，因此，建安文學居於中間過渡位置，始為魯迅先生所留意，這是魯迅先生能點明「曹丕的時代乃是一文學自覺時代不可忽視的重要關鍵。

⁶⁹ 章太炎：《國學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54。

二、劉師培對魯迅提出「文學自覺觀念」 之影響

(一) 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對魯迅之影響

魯迅先生與魏晉文學之間，除了前小節所提到——受章太炎先生的影響之外，劉師培先生的《中古文學史講義》一書，對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更是大大地超越前者之重要性，因為章太炎先生啟發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乃以引起魯迅先生對魏晉時期的興趣為多；但是要說到劉師培先生的《中古文學史講義》，此書中的不少意見均為魯迅先生研究魏晉文學，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當中許多細節更宛若「文學自覺觀念」的雛型，甚至在某些方面較之魯迅先生更為詳備，差別僅在於未提出「文學自覺」一詞罷了，因此劉師培先生對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實在是鋪橋設路、功不可沒。

劉師培先生（1884-1919）字申叔、號左庵，筆名光漢、光漢子、激烈派第一人，乃公認民末清初的國學大師。劉家三代治經，「曾祖父淇、祖毓崧、伯父壽曾、父貴曾，當清代道、咸、同、光之時，俱以經術享譽東南，尤精《春秋左氏傳》，成一家之學。」⁷⁰傳至劉師培先生時已是第四代，是相當有名的經學世家，劉氏自幼天資聰穎，過目不忘，加上家學淵源，博通古籍群經，年僅三十餘歲便名滿天下，陳平原先生也說：

⁷⁰ 程千帆：《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晚清多奇才，劉師培便是其中不可不提的一位。翻開《劉申叔先生遺書》，你會驚訝，一個三十六歲便英年早逝的學者兼政治家，竟能有如此豐富的著述！單是《遺書》所收，便有論群經及小學者二十二種，論學術及文辭者十三種，群書校釋二十四種，詩文集四種，讀書記五種，教科書六種，合計七十四種。⁷¹

而使年紀不相上下的黃侃先生拜之為師，更為學術史上為人所津津樂道的美事。更不要說僅差劉師培先生三歲的魯迅先生，就學術輩份而言，早已是分屬兩代：「在正常情況下，劉師培應同魯迅、錢玄同等人一樣，屬於同輩學人。然而劉師培以自己的天資和努力、成就和貢獻，超前人入晚清一代前輩學人中，並取得了與當時的大師級學者並列的地位，因而構成了他與魯迅學術聯繫中並非平視的前提和基調。」⁷²。

可見劉師培先生雖然學問早成，且年紀與黃侃、魯迅等先生不相上下，然而由於他個人家學與實力，早已使得他成為與章太炎同級的師長，魯迅先生對於劉氏的學問應該也是心服的。

劉氏年三十四歲，始任北京大學教授，可以說劉氏進入北大的那三年，已經是他人生中的最後三年了，劉氏在當時身體狀況一落千丈，病得十分嚴重，許多人都訝異於他的憔悴，連上課都無法提高聲量，但是就在他身體狀況最惡劣的此時，撰成了現今對研究中古文學極為重要的一本著作《中古文學史講義》，這本書是劉氏為教學方便，輯錄排比中古文學的重要資料，略加引論和穿插案語連綴而成的。然而即便這是一本為了教學而編成的講義，然而治績至目前為止仍為後人所肯定，咸皆認為「近代學者中，把中古文學剝離出來，視為一獨立單元來研究，自劉師培始。」替「中古文學研究」開了一個「好頭兒」。

⁷¹ 陳平原：《當年遊俠人》，（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3年11月），頁140。

⁷² 張杰：魯迅與劉師培的學術關係，《魯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6期。

因此其學術價值不在話下，程千帆先生也說這是本「底蘊深厚的文學與學術追求交相滲透且水到渠成的某種結果。」⁷³。

劉師培先生對於中古文學的意見，更是非常受到時人之重視與肯定的，蔡元培先生《劉君申叔事略》曾載：「所編講義，元元本本，甚受學生歡迎。」可見此書深受北大同學的喜愛。北大同學是如此，在魯迅先生而言，不僅看過這本書，劉師培先生治中古文學之學術功績是他贊賞的對象，他曾公開表明對劉師培治中古文學史的方法與成績上的推崇：「我看過的已刊的書（案：指中國文學史之類的書）無一冊好，只有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⁷⁴從時間順序來看，從劉氏撰《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到魯迅先生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相差十年，而魯迅先生在演講時已公開承認劉師培治中古文學史的成績，還說：「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裡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較詳一點。」⁷⁵、「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為容易了，因為有人作過工作。」輯錄關於這時代的文學評論有劉師培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⁷⁶

於眼界極高的魯迅先生來說，對於這第一本將中古文學抽出處理的講義，評價如此實在是不多見的。所以可知在魯迅先生心中，他乃是以劉師培先生治中古文學為師法認同之對象，在廣州之演講亦是在此上面加添磚瓦。那麼，既然從上述的言論當中，可見魯迅先生曾看過劉師培先生的《中古文學史》，並且魯迅先生對於劉師培先生所作的工作，又是給予極高的贊賞，那麼魯迅先生對中古文學的理解，難免受到劉師培先生的影響。陳平原先生也直指：

⁷³ 程千帆：《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導讀，（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

⁷⁴ 《魯迅全集》第九卷。

⁷⁵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頁 304。

⁷⁶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頁 304。

魯迅關於魏晉文學的若干精采判斷，實得益於劉師培的著述。如魯迅稱漢魏文章特色是「清峻，通俗，華麗，壯大」，這與劉師培「清峻、通脫、騁詞、華靡」的判斷大體一致。⁷⁷

張杰先生更稱：

魯迅稱魏晉時代「是文學自覺的時代」，從中國文學發展的角度，賦予魏晉時代以重要地位。這對後來的文學史撰寫，產生過重要影響。但是，魯迅對他的這一論斷只作過發揮，沒有專門作過論證，其來源值得深究，如果一旦將魯迅與劉師培構成密切的關係，這一問題便迎刃而解：魯迅的觀點是在借鑒劉師培縝密索驥史籍的結論下形成的。⁷⁸

雖然魯迅先生極可能因為劉師培先生的緣故，放棄了對於中古文學做較為學術性、專門化的論證文章，因此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所言有限，後續並無細密地學術上的論證，僅以演講稿的方式發表，不免有些令人感到粗疏之處。但從張杰先生之言，我們卻可以發現劉師培先生對魯迅先生後來提出「文學自覺」此一重要觀念，真是有相當的重要性。

（二）魯迅對劉師培意見之繼承與轉化

⁷⁷ 陳平原：作為文學史家的魯迅《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麥田出版社 1997 年），頁 104。

⁷⁸ 張杰：魯迅與劉師培的學術關係，《魯迅研究月刊》，2000 年第 6 期。

究竟劉師培先生的《中古文學史》其中有哪些觀點使得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的看法呢？其實，劉師培先生以國學大師的身份，撰寫《中古文學史》，此一舉動的背後，恐怕蘊含了深義。我們知道身處經學世家的劉師培可謂文史兼通的一個奇才，年紀輕輕，學問就如此之好，為中古文學撰稿，實在有些屈就，至少在其他人是肯的，何況劉氏也非治文學的專家，他大可有更好的選擇，更理想的著作計畫。且雖然說《中古文學史講義》是授課之餘，為了上課方便才編成的，但是，何以要如此大費周章？《中古文學史講義》是在他人人生中最後三年在北大間完成的，這除了標誌著文選派在北大的勝利，其實或許也蘊藏了劉師培與六朝文學一種極深的淵源關係。在劉師培之友——南桂馨曾說：

清三百年駢文莫高於汪容甫，六朝文筆之辨則以阮文達為最堅。……申叔承汪、阮風流，刻意駢儷，嘗語人曰：天下文章在吾揚州耳。⁷⁹

「天下文章在吾揚州」此話真是講得豪氣萬丈，亦可看出劉氏對汪中和阮元都極推崇，「承汪、阮風流」，尤其是後者，劉氏對六朝文學的許多意見上，曾撰過不少文章，大力推廣阮元之說，如《廣阮氏文言說》一文說：

阮氏《學經室集》列《文言說》，以儷詞韻語為文言，又徵引六朝文筆之分以成其說。⁸⁰

另外，於《文學辨體》一文中，又特定說明其意見是以阮氏之意見出發：

此篇以阮氏〈文筆對〉為主，特所引群書，以類相從，各附案

⁷⁹ 南桂馨序：《劉申叔先生遺書》。

⁸⁰ 劉師培：《廣阮氏文言說》《近代文論選》，頁533。

詞，以明文軌。⁸¹

劉氏指出汪中等人所追隨的傳統正是六朝的齊梁文學。甲辰年自述詩也道：

桐城派人有宗派，傑作無過姚劉方。我今論文主容甫，采藻秀出追齊梁。⁸²

文章源始 中，表達對桐城派文學觀之不滿：

韓、柳之文，希蹤子史，即傳志碑版之作，亦媲美前賢。然繩以文體，特古人之語，而六朝之筆耳……至北宋蘇軾推崇韓氏，以為「文起八代之衰」。明代以降，士學空疏，以六朝之前為駢體，以昌黎諸輩為古文，文之體例莫復辨，而文之製作不復睹矣。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於方、姚之文，奉為文章之正軌；由斯而上，則以經為文，以子史為文……而文章之真源失矣。⁸³

為何劉師培先生對阮元、汪中之說如此推崇呢？周勛初先生曾指出：

劉氏的學說，是《文選》派的後勁。這與他個人的家世有關。劉師培出身儀徵一個三代傳經的家庭，而儀徵地方文風的崛起，深受前輩阮元的影響。阮元官位顯赫，而又熱心文教事業……他還在文學思想方面提出了新的見解，對於清代中世以後文風的改變發生過很大的影響。作為儀徵這一地區的後學，劉師培繼起發揮阮元學說，於是又有人稱這一流派為「儀徵學

⁸¹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頁3。

⁸²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頁170。

⁸³ 劉師培：文章源始 《近代文論選》，頁563。

派」。儀徵屬揚州轄下，清代蘇北地區文風很盛，出現過汪中等不少學者，這是一批在樸學上有高深造詣而又有其共同或近似觀點的學者，有人總稱之謂「揚州學派」。⁸⁴

我們可以知道劉氏所身處的儀徵，深受阮元之影響力的壟罩。再加上，劉氏深以自己與阮元、汪中同為揚州人為傲，連帶的在學說上也形成一路，程千帆先生則認為：

就文學觀點而言，劉師培基本上是承接鄉先賢阮元鼓吹「文言」、推崇翰藻的學脈……儘管對「文」的正名不無偏激，但對公正了解長久以來遭古文家厭棄的六朝文學的特徵，卻是一種強有力的推動。⁸⁵

以上二說不謬矣。劉師培先生也在汪、阮的影響下，傾向於「緣飾文采」的文學觀。在他的《論文雜記》一文中曾說：

中國三代之時，以文物為文，以華靡為文，而禮樂法制、威儀文辭，亦莫不稱為文章。推之以典籍為文，以文字為文，以言辭為文。其以文為文章之文者，則始於孔子作文言。蓋文訓為飾，乃英華發外，秩然有章之謂也。故道之發現於外者，為文事之條理秩然者，為文而言詞之有緣飾者，亦莫不稱之為文。古人言文合一，故借為文章之文。後世以文章之文，遂足該文字之界說，失之甚矣。夫文字之訓，既專屬於文章，則循名責實，惟韻語儷詞之作，稍與緣飾之訓相符。⁸⁶

⁸⁴ 周勛初：黃季剛先生《文心雕龍札記》的學術淵源 收錄於黃侃《文心雕龍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4。

⁸⁵ 程千帆、曹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導讀 收錄於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頁3-5。

⁸⁶ 劉師培：《論文雜記》收於羅聯添先生所編《中國文學史論文精選》，（學海出版社，1984年），

從其文學觀點來看，劉氏以為雖然中國古代「文」字的用法十分廣泛，從禮樂、法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無一不可被稱作是「文」，但是從小學的角度立論「『文』訓為『飾』」，且孔子作文言開始，就可知「文學」應該是一種「英華發外」，具有「有文采」的一種表現狀態，他借由從字源上對「文」的分析為「文學」定義，在「文章源始」一文也有相同的例子：

積字成句，積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緣起，先窮造字之源流。⁸⁷

可見他對「文學」的定義一直都不忘從小學的角度加以切入。他對於魏晉六朝文筆之分的解釋，也以「偶文韻語」為標準來區分之。

魏、晉、六朝，崇尚排偶，而文與筆分：偶文韻語者謂之文，無韻單行者謂之筆。觀魏、晉、六朝諸史各列傳中，多以文筆並言；則當時所謂筆者，乃直樸無文之作也；或用之記事之文，或用之書札之文，體近於語，復與古人之語不同。⁸⁸

並得出這樣的結論，認為漢魏六朝之世「文章之界大明」，也就是六朝的文學觀念在劉氏心目中，是較切近他從小學來看的文學觀念：

故漢魏六朝之世，悉以有韻偶行者為文，而昭明編輯文選，亦以沉思翰藻為文，文章之界至此大明矣。降及唐代，以筆為文，如昌黎言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以詩為文，如杜詩「文章憎命達」……夫詩為有韻之文，且多偶語，以詩為文，似未盡非。若以筆為文，則與古代文字之訓相背矣。⁸⁹

頁 342。

⁸⁷ 劉師培：《文章源始》《近代文論選》，頁 557。

⁸⁸ 劉師培：《文章源始》《近代文論選》，頁 561。

⁸⁹ 劉師培：《廣阮氏文言說》《近代文論選》，頁 533。

劉氏除了在文學觀念上與六朝頗為相近，其友南桂馨還說劉氏在書寫時，也刻意模仿漢魏文風：

申叔初年充塞報章文字，伸筆疾書，但以飽滿暢達為貴；若其經心刻意之作，則必體仿六朝，浸浸焉上攀漢魏。⁹⁰

總之，劉氏受到地緣上學派之影響，又在對同鄉的兩位前輩的敬服之下，對桐城有所不取，繼承的是清代中後期的「文選派」之傳統，他承接著汪、阮的意志，對「為古文家所厭棄的『六朝文學』」，再以自己過人的才識，深耕鑽研，此一立場與意願，一直在著作中表露無疑。

究竟《中古文學史講義》對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之具體影響為何？以下我們將從這本書中的內容，與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的 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 一文，兩相比對，看看劉師培先生此書如何使魯迅先生能提出「文學自覺觀念」的。首先是此書中，第三課開頭提到「建安文學，格易前型」的一段話，無疑有「文學自覺」的味道於其中，值得我們注意，他說：

建安文學，格易前型，遷蛻之由，可得而說：兩漢之世，戶習七經，雖及子家，必緣經術；魏武治國，頗雜刑名，文體因之，漸趨清峻，一也。建武以還，士民稟禮，殆及建安，漸尚通佻，佻則侈麗哀樂，通則漸藻玄思，二也。獻帝之初，諸方棋峙，乘時之士，頗慕縱橫，騁詞之風，肇端於此，三也。又漢之靈帝，頗好俳詞，下習其風，益尚華靡，雖迄魏初，其風未革，四也。⁹¹

這裡劉氏明白的指出到了「建安文學」與前代有明顯之不同，從文學

⁹⁰ 南桂馨序：《劉申叔先生遺書》，（華世出版社），頁 39。

⁹¹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頁 7。

史的角度來看，是種「遷蛻」，「遷」即變遷、「蛻」即變化，都是說此時期文學，有個大轉變之意。劉氏並提出四個可能原因，來解釋建安時期文學上的轉變，而恰好在魯迅先生《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我們也發現魯迅先生對於劉氏的意見，是有所吸收與轉換的。據劉氏所言建安文學之所以「格易前型」，第一點是曹操本人治國的風氣，重「刑名」，上行下效，因此時文轉為「清峻」，魯迅曾說：「董卓之後，曹操專權。在他的統治之下，第一個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嚴的，因為當大亂之後，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亂，故曹操不能不如此。因此之故，影響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風格。」⁹²與劉氏的意思幾乎是一模一樣。

第二點，劉氏又說自東漢光武帝以來，由於士人重視名節，講究「禮」過了頭，到了魏晉之時士人解放，於是文章上也呈現「通脫」的特色，且由於「通脫」，造成兩種新的文學風氣出現，其一是「侈麗哀樂」，這就是說在魏晉時期文章中，加入了作者本身的情感，顯得內容上多了抒發胸臆之人生色彩；其二「漸藻玄思」則是說在文章中出現不少有關道家等談玄說理的文章。於是「通脫」這點特色，也為魯迅先生所掌握並進行闡發，類似的意見如下，魯迅先生的話是這樣的：

他為甚麼要尚通脫呢？自然也與當時的風氣有莫大的關係。因為在黨錮之禍以前，凡黨中人都自命清流，不過講『清』講得太過，便成固執，所以在漢末，清流的舉動有時便十分可笑了。……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來反對這種習氣，力倡通脫。通脫即隨便之意。此種提倡影響到文壇，便產生多量想說甚麼便說甚麼的文章。⁹³

第三點劉氏又指出自從東漢獻帝為董卓所挾持，天下大亂，各派

⁹²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頁 304。

⁹³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頁 304~305。

人馬對峙，覬覦皇位，於是時勢頗類「戰國時期」，人才流通，各為其主，士人必須選擇可靠的政治主依附，擇良木而棲，在這種情形底下，人人都需有一套治國定天下的學說，於是文風一轉下開了六朝「騁詞」之風。第四點則是說魏代文學，繼承了東漢靈帝時已有的華靡風格。

我們可以看到劉氏歸納魏初文學所以異於前代者，其特點分別是「清峻」、「通脫」、「騁詞」、「華靡」。第三點「騁詞」與第四點「華靡」，魯迅則稍稍改為其他，他說：「歸納起來，漢末、魏初的文章，可說是：『清峻』、『通脫』、『華麗』、『壯大』。」但是，還是可知魯迅對建安文學之特色的概括，基本意見仍是在劉氏意見的基礎上轉出的。因此，可以說「文學自覺」的觀念，在劉氏就已說得十分清楚，此說對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具有十足的關鍵作用。

「建安文學，格易前型」在某種意義上成為 1927 年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源頭，……在總的判斷上，魯迅以曹丕時代為「文學的自覺時代」應該就是來自劉師培的「建安文學觀，格易前型」，這一觀念也由於魯迅的重新表述成為當今中國文學史觀的一部分，建安朝也被普遍用作上古文學和中古文學的分界點。似乎這也就是劉師培浩繁文學論述中唯一被繼承的遺產。⁹⁴

劉師培先生還有另一段話，同樣強調由漢至魏文學的重要變化，這段話更明顯地解釋了由西漢、東漢乃至於建安文學，整個逐漸轉換的過程，我們再將之列出：

由漢至魏，文章遷變計有四端：……東京以降，論辯著作諸作，往往以單行之語運排偶之詞，而奇偶相生，致文體迥殊於西漢。建安之世，七子繼興，偶有撰者，悉以排偶易單行，即非有韻

⁹⁴ 王風：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2 年），頁 28。

之文，亦用偶文之體，而華靡之作，遂開四六之先，而文體復殊於東漢，其遷變者一也⁹⁵。

以上第一點說從西漢到建安文學，文章多以排偶取代單行。

西漢之書，言詞簡直，故句法貴短，或以二字成一言，而形容事物不爽鎔銖。東漢之文，句法較長，即研鍊之詞，亦以四字成一語。魏代之文，則合二語成一意。由簡趨繁，昭然不爽，其變遷者二也⁹⁶。

以上第二點則言建安文學在「語言使用技巧」方面，有「由簡入繁」的趨勢。

西漢之時雖屬韻文，而對偶之法未嚴。東漢之文漸尚對偶，若魏代之體，則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致失本真，其變遷者三也⁹⁷。

第三點劉氏則從批判的角度認為魏代文學重視對偶，導致文章失去本真。

西漢文人，若楊、馬之流，咸能洞明字學，故選詞謹字亦能古訓是式，非淺學所能窺。東漢文人，既與儒林分列，故文詞古奧，遠遜西京。魏代之文，則又語意易明，無俟後儒之解釋，其變遷者四也⁹⁸。

⁹⁵ 劉師培：論文雜記 收於羅聯添先生所編《中國文學史論文精選》，(學海出版社，1984年)，頁5-6。

⁹⁶ 劉師培：論文雜記，頁6。

⁹⁷ 劉師培：論文雜記，頁6。

⁹⁸ 劉師培：論文雜記，頁6。

第四點則是稱讚魏代文學，既無西漢文字古奧之弊，且簡單易懂，呈顯出簡脫的文字風格。這裡所提出的四點分別由「偶文之體」、「言詞趨繁」、「重視聲色」、「語意易明」來說明由漢至魏的文學變化，我們可以看到他是比較重視文學內部變化而論斷的，但是對於魏代文學與前此以往文學不同的強調，仍是態度一致的。

其次，魯迅先生將「文學自覺」歸於曹丕的時代，此一立論都是緣於三曹父子雅好文學的背景著眼，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當中，開始便從曹氏父子說起，這與劉氏對三國時期獨重魏代文學，也有關係：

建安文學，實由文帝、陳王提倡於上。觀文帝《典論·選篇》云：「所著書、論、詩、賦，凡六十篇。」（《御覽》九十三引）又《與王朗書》曰：「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思王之文，久為當世所傳，故一時文人興起者眾。至於明帝，雖文采漸衰，然亦篤好藝文，觀其《以所作〈平原公主誅〉手詔陳王植》曰：「吾既薄才，至於賦、誄特不閑」……又高貴鄉公《原和迺等作詩稽留詔》云：「吾以暗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故有魏一朝，文學獨冠於吳、蜀。」⁹⁹

所以魯迅先生也說：

孝文帝曹丕，以長子而承父業，篡漢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歡文章的。其弟曹植，還有明帝曹睿，都是喜歡文章的。¹⁰⁰

⁹⁹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頁18~19。

¹⁰⁰ 魯迅：《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頁306。

劉氏注重曹氏父子對當時文學所以興旺的影響，也成為魯迅分析「文學自覺」之因的重要線索。我們推測魯迅先生所以說「用近代的眼光看來，曹丕的一個時代可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乃至於今日談文學自覺都很難不提曹丕的《典論 論文》。這和劉師培先生談魏晉文學不離曹氏父子的領導作用是有關的。

另外，劉氏又於第四課「魏晉文學之變遷」：

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輩出。其文約分兩派：一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簡約、文質兼備，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名、法家言為近者也。……溯其遠源，則孔融、王粲實開其基。一為嵇阮、阮籍之文，文章壯麗，采騁辭，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縱橫家為近者也。此派之文，盛於竹林諸賢。溯其遠源，則阮瑀、陳琳已開其始。¹⁰¹

劉氏將晉宋以後的文士分類，並找到魏代的文人做為源頭始祖，以明晉宋文學之淵源，這在當時極具「文學史觀」的作法，這是從摯虞的作法中汲取靈感。劉氏在「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中強調：

文學史者，所以考歷代文學之變遷也。古代之書莫備於晉之摯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別。志者，以人為綱者也。流別者，以文體為綱者也。¹⁰²

魯迅先生在這方面，也學習了劉師培先生對中古文學材料重視文學史觀的呈現，劉氏這種具有客觀性的作法，幫助了魯迅先生將魏代視為自覺時代的信心，且如果劉氏能為爾後晉宋文學，在魏代找到原型的合理根基，那麼又為甚麼不能依此而論，「曹丕的一個時代是文學自覺

¹⁰¹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頁32。

¹⁰² 同上，頁114。

的時代」呢？

不只如此，劉氏還具體地指出漢代與魏代文學所以不同之處：

魏文與漢不同者，蓋有四焉：書檄之文，騁詞以張勢，一也；論說之文，漸事校練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質直而屏華，三也；詩賦之文，益事華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與建安以前有異，此則研究者所當知也。¹⁰³

這又是更增強了「魏代是文學自覺的時代」說服力。

由以上可證劉氏對於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其影響是點點滴滴，小至魏晉時期所強調的個別人物的，劉氏也都給予了魯迅先生一些啟發。羅常培先生所記的《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是根據劉氏上課所摘錄的課堂重點，其中緒論中講到自兩漢以迄唐初，可分六期，分別是兩漢、魏、晉宋、齊梁、梁陳、隋至初唐，其中第二期說：「此期可專治建安七子之文，亦可專治王弼、何晏之文。」，又說「魏代王輔嗣何平叔兩家之文，傳於今者獨少，而校練名理，實為晉宋先聲。」可見劉氏在課堂上很強調何王二人對六朝文學發展的重要性，於是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一文，提到過的建安七子、王弼、何晏，也都成為魯迅先生刻意著重的核心人物。魯迅先生所喜愛的嵇康，也在劉氏的肯定之中：

嵇叔夜文，今有專集傳世。集中雖亦有賦箴等體，而以論為最多，亦以論為最勝，誠屬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研究嵇文者自當專攻乎此。觀其《養生論》、《聲無哀樂論》等篇，持論連貫，條理秩然，非特文自彼作，意亦由其自創。其獨到之處一在條理分明，二在用心細密，三在首尾相應。果能得其胎息，則文

¹⁰³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頁32。

無往而不達，理雖深而可顯。¹⁰⁴

若拿劉氏與章太炎先生兩者比較，雖然兩人同在北大，共同為六朝文學努力，但是一個是將六朝文的勢力加以統合並擴張勢力，一個則以著作徹底在教育上、學術上取得地位。又，如果說章太炎推崇魏晉文，是為了自己論學與性情上的相補相濟；那麼，劉師培對中古文學的注目與推廣，則無疑是出於對於揚州學派情感性之認同。劉氏撰成《中古文學史講義》此書，許多人將之理解為「文選派」在北大的大勝利，也是他個人終於將汪阮學統發揚光大後，集大成的一本著作，而劉氏對六朝文學這一份獨特的情感，也終於可借由撰成《中古文學史講義》，而得到一種理想的依歸與踏實。然而，劉氏此舉最大的勝利，恐怕也是超乎他自己所能想像，因為《中古文學史講義》，魯迅先生提出「文學自覺觀念」，「文學自覺觀念」的形成，是文選派自清代中後期以後，勢力的總體凝結所迸射出來的，而「文學自覺觀念」的存在，更象徵著後人對六朝文學價值之體認，已經透過魯迅先生的手上，達到一定程度的深化，此後，六朝文學研究的發展前途，在劉師培先生對魯迅先生的幫助下，猶如一只張開布帆的大船，從此更可無拘無束地，航向更廣闊的未來。

小結

以上論述基本上皆立基於此一「設想」：以「個體」為主，盡可能重構「提出觀念的行動者——魯迅先生」其精神氣質、學思歷程與所處之時代如何相互映發形成對魯迅先生有利的「思想資源」、「立說支點」，使得「文學自覺觀念」蔚然成形。舉凡「觀念的萌芽」皆有其一定程度的複雜因素綜合作用著，即使選擇了一種詮釋路向，且看起來

¹⁰⁴ 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頁123~124。

言之成理地去解釋它，也難保在當中有太多「紛繁的資料」以及「旁出於我們所能想像的因素」恆互其中，使之未能盡善，所能勉力為之者，只是儘可能使「文學自覺觀念所以發生的可能解釋」呈顯出具有「整全」之意義與價值罷了，而「探源」總是為了「疏流」的方便。